

从空间排斥到空间重构 ——《JR上野站公园口》的第三空间书写

张柔柔, 孔 月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3日

摘 要

研究以柳美里的小说《JR上野站公园口》为分析对象, 运用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 并结合米歇尔·福柯的规训理论, 探讨了都市空间中无家可归者的生存困境与空间重构实践。论文通过文本分析, 将论述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空间层面, 分析了上野公园等物质空间如何通过规则和管理对边缘群体进行物理排斥与规训; 第二空间层面, 探讨了主流社会规范和创伤记忆如何共同作用, 形成对边缘者的精神压迫; 第三空间层面, 论述了无家可归者如何通过形成自治共同体, 进行日常抵抗和价值重估, 从而建构出具有抵抗性、超越性和开放性的生存空间。研究最终指出, 都市边缘空间不仅是排斥的场所, 更是无家可归者重构生存意义的实践场域, 展现了一个从物质排斥、精神内化到实践重建的辩证过程。

关键词

《JR上野站公园口》, 第三空间, 空间重构

From Spatial Exclusion to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 Thirdspace Reading of *Tokyo Ueno Station Park*

Rourou Zhang, Yue Kong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August 17, 2026; accepted: October 2,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3,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Yu Miri's novel *Tokyo Ueno Station Park* as its primary object of analysis and employs Edward Soja's theory of Thirdspace, in conjunction with Michel Foucault's theory of discipline,

文章引用: 张柔柔, 孔月. 从空间排斥到空间重构——《JR 上野站公园口》的第三空间书写[J]. 世界文学研究, 2026, 14(5): 602-609. DOI: 10.12677/wls.2026.145084

to examine the living predicaments of homeless people and their practices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n urban space.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the study examines the novel on three interconnected levels. At the level of Firstspace, it analyzes how material spaces such as Ueno Park physically exclude and discipline marginalized groups through rules, regulations, and spatial management. At the level of Secondspace, it explores how dominant social norms and traumatic memories interact to produce psychological oppression and reinforce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ose excluded from mainstream society. At the level of Thirdspace, it examines how homeless people construct autonomous communities through everyday resistance and the revaluation of social values, thereby creating a form of living space characterized by resistance, transcendence, and openness. The study ultimately argues that urban marginal spaces are not merely sites of exclusion but also practical arenas in which homeless people re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The novel thus presents a dialectical process that moves from material exclus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rnalization to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ved space through social practice.

Keywords

Tokyo Ueno Station Park, Thirdspac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9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稳定雇佣体制动摇,非正规雇佣扩大,贫困日益显性化;据厚生劳动省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概数调查,2003年全国无家可归者约2.5万人,其中约40.8%的人集中在城市公园[1]。2026年厚生劳动省调查仍确认全国有2481名无家可归者,其中东京都为507名,都市公园占确认场所的23.9%[2]。关于东京的社会空间排除研究也指出,都市空间的变化会影响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实践与价值观[3]。柳美里的《JR上野站公园口》(2014)正是对这一社会现实的文学回应。小说以上野公园为主要舞台,以老年流浪者阿和的人生轨迹为主线,刻画了流落都市街头的无家可归者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承载着鲜明的社会批判性与人文关怀。

已有研究主要从社会批判、贫困问题和空间叙事等角度讨论《JR上野站公园口》。山崎正纯从天皇制、无家可归者表象与净土真宗三重视角分析作品中被主流历史叙事排除者的“运命”与“言语”[4];孙军悦揭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伴生的社会排除与相对剥夺,并指出物质意义上的“住宅”并不等同于精神与社会联结意义上的“家”[5];朴银姬则从空间隐喻和记忆重构的叙事角度出发,展现出含有多重意蕴的文本空间[6]。这些研究为理解作品的社会批判与空间书写奠定了基础,但较少涉及三重空间之间的关系分析。山崎与孙军悦侧重社会排除的结构与贫困本质,本文将补充空间维度,考察排除如何在具体物质空间中日常化运作;朴银姬虽已运用空间叙事,却未以第三空间概念进行系统分析,本文以索亚的第三空间论为基础,将重心由“空间如何被重构”推进到“被排除者如何在秩序缝隙中主动建构生存空间”,进而考察三重空间如何在具体生活实践中彼此渗透、相互制约并共同生成。彼此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

爱德华·索亚深受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思想和福柯“空间与权力”思想的影响,进一步阐释了对空间的理解,提出“第三空间”理论[7]。第一空间是人类日常实践与社会活动的物质载体,是所有可感知空间的集合,比如建筑、村庄等。第二空间即构想的精神空间,以知识、符号、话语为载体,规

定人们对空间的认知与行为方式。第三空间是前两种间相互交织后形成的、兼具现实性与想象性的社会空间。它既包含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要素,又通过具体实践对既有空间关系进行重新组织,它是打破二元对立、兼具抵抗性、超越性与开放性的动态空间,支配与抵抗都能在其中共存[8]。

本文将以上述三重空间为核心分析框架,同时辅以福柯的规训理论探讨该作品如何通过物质空间和构想空间表现边缘者的空间排斥及其内化过程,被排除者又如何通过日常实践重新生产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等问题,即考察物质排斥、精神内化与实践重建如何在具体空间实践中相互作用,并共同形成边缘者的生存空间,以期丰富柳美里作品的研究视角。

2. 上野公园和小屋:物质生存空间的排斥与规训

第一空间是可感知的物质现实空间,也是城市管理机制直接作用的场所。在《JR 上野站公园口》中,上野公园与蓝帐篷小屋共同构成无家可归者的基本生活环境。前者通过规则、清扫与编号管理压缩流浪者的活动范围,后者以物理脆弱性与法律不稳定性和持续监视强化其生存不安。二者相互配合,在物质层面实现了对边缘者的空间排斥和行为规训。

上野恩赐公园名义上属于全体市民,但其中嵌入了多重针对无家可归者的空间规则。摺钵山的夜间禁入、不忍池周边的垂钓与投喂禁令,以及对帐篷搭建的限制,看似面向所有游客,实际上直接影响无家可归者的基本生存需求:夜间禁令压缩睡眠空间,垂钓与投喂禁令切断获取食物的方式,帐篷限制则迫使其退守更隐蔽的角落。规则并非直接驱逐,而是通过不断压缩可使用的空间,使无家可归者的生存活动只能在城市缝隙中展开。

这种日常性的限制在国家级仪式前后会升级为搜山式的特别清扫。管理方要求流浪者在指定时间转移帐篷和行李,并在清扫后以“草坪养护中”等标牌重新定义空间功能,抹去无家可归者生活过的痕迹。规范化裁决是福柯规训中的一个技术手段,它以某种共同标准为依据划分正常与异常,并通过奖惩、纠正等手段,使偏离规范的个体重新回到规范轨道之中[9]。从福柯规训理论看,这种清扫通过设置“整洁、秩序化”的空间标准,将不符合规范者排除出去。也就是说,平日隐性的空间排斥,在特殊时刻转化为集中性的空间清除,使无家可归者的存在本身被视为对公共空间秩序的干扰,由此可见,搜山并非单纯的环境清扫,而是通过空间秩序的重新划定实现对边缘者存在的排除。

在空间边界之外,号码牌制度进一步完成了符号层面的规训。作品中,无家可归者的行李上悬挂着编号调查表——“像汽车牌照一样,按公园内的各自‘地盘’分别编有整理号码”([10]:p.128)用以标记其活动范围并要求持续悬挂。行政部门由此将分散的个体转化为可以统计、识别和管理的对象。编号不仅规定“在哪里存在”,也不断提醒其“以何种身份存在”。因此,空间排除规定活动边界,符号规训则将这种边界进一步内化为身份意识,二者共同构成物质空间中的管理机制。

与公共空间的规则性排斥相对应,流浪者自行搭建的小屋体现出边缘生存的物质脆弱性与法律不稳定性。这些由蓝色防水布、纸板等材料拼成的小屋通常位于树荫、斜坡和池畔等角落,既是必要的栖居地,又始终处于可能被拆除的状态。防水布漏水、纸板无法御寒,台风甚至可能将小屋吹散;同时,流浪者并不拥有土地使用权,行政部门可以随时拆除这些临时居所。小说写道,小屋的拆除“中间不休息的话两小时就能收拾完,重新组装却要半天时间”(p.143),而一旦卸下防水布与蓝钢板,家当一瞬间就变成了一堆成山的笨重垃圾。这种劳动成本上的不对等,直观呈现了管理者与边缘者之间的不平等空间关系,管理方一纸通知即可改写空间规则,被排除者却须以数倍的时间与体力重建生活。

此外,小屋还笼罩在持续监视之下,并进一步促成自我规训。不忍池边的流浪者不敢搭建完整帐篷,只以纸板围出简单区域,因为“警察和管理所会巡逻,周围公寓的住户也会打电话给区政府投诉”(p.137)。官方巡逻与周边居民的注视形成双重监督,使流浪者主动减少行李、降低存在感并尽量保持安静。

这种无需外力强制的自我限制,正是规训机制最深刻的效果,正如福柯所言:“在监视视线的压力下,每个人都会实现自我监禁”[11]。由此,简陋的小屋不仅是身体暂时停留的场所,也成为规训作用持续发生的空间。第一空间的主要特征因此表现为:公共空间通过规则和符号划定边界,居住空间通过脆弱性与监视强化控制,最终使边缘者的身体被压缩在有限而不稳定的生存范围内。

3. 社会规范和创伤压力:构想空间的内化与精神囚禁

如果说第一空间主要作用于身体与物质生存,那么第二空间作为索亚所言的构想空间,主要作用于认知、想象、精神和价值判断。本文将其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一是外部社会规范所形成的构想空间,即主流社会借助职业、家庭、正常生活等符号建构出的“正常人生”;二是这些规范进入个体内部后,与人生创伤和记忆相互作用形成的精神表征。二者由外而内,共同构成第二空间的精神压迫。

上野公园和车站中往来的人群,是既有社会规范的日常表征。作品中写铁路站台上“高跟鞋、皮鞋、靴子、长靴……众多脚步声与边走边用手机打电话的人声”(p. 88),这些穿戴职业装束、遵循固定时间节律的劳动者,构成一种被视为“正常”的人生图景。西乡隆盛铜像旁“两个穿着丧服、白领模样的男人站着交谈”(p. 91),戴白色厨师帽的男子快步穿过神社鸟居(p. 130)——这些日常景观并不带直接恶意,却以无声的符号性规范压力,不断对照着无家可归者的处境。在持续观看他人职业、家庭和生活节律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自身位置的不同。无家可归者身处公共空间,却始终处于人群边缘,这种空间上的并置使第二空间的社会规范获得了持续的可见性。他们被排除在这套劳动体系之外,职业身份的丧失,也使其难以获得社会所认可的存在价值。索亚指出,构想空间中的“想象的地理学往往试图将自身表征为真实的地理学,通过形象与符号限定并安排现实”[8];职业、家庭等日常符号,正是第二空间将“正常”人生秩序投射到现实的方式。

“家”同样是这种构想空间的重要符号。粉色自行车、结伴看展的老人、牵狗散步的家庭等日常场景,都指向稳定家庭与固定居所。在主流社会的价值想象中,拥有家庭、安家生活是一条理所当然的人生路径。阿和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他在福岛有妻子和儿子,并通过外出务工承担家庭责任。然而妻子与儿子的相继离世打破了这一生活轨道,使“家”从现实归属转化为一种不断提醒其缺失的符号。后记中七十多岁的流浪者那句“你有,我们没有”的低语,也道尽了边缘者对“家”这一符号的复杂感受。家早已不只是居住场所,更是社会认可、人生完整、生命尊严的集合象征。由此,家庭与职业等社会表征并非中性的背景,而是构成第二空间的重要价值尺度,使无家可归者持续感受到自身与“正常人生”的距离。

当这种外部规范长期作用于个体之后,便可能进入自我认知,并与个人经历共同重组现实感知。正如索亚所言,当构想的精神空间足够强大时,就会反过来规定与重塑人们对现实的感知。阿和的精神世界正呈现这一过程:列车声、雨天等日常感官刺激,会不断触发过去的记忆,使现实空间被记忆重新解释。列车轰鸣尤其具有贯穿性,它连接青年时期离乡务工、接到儿子死讯以及最终流落上野等人生断裂时刻。作品中提到“又一次听见那个声音”“在头颅内侧奔涌,仿佛脑中有一个蜂巢、几百只蜜蜂要一齐飞出”(p. 10),这表现出当下感知与过去经验之间边界的瓦解。换言之,第二空间并非脱离现实的纯粹幻想,而是通过记忆和想象对现实进行重新组织,使过去的意义持续进入当下。

雨水则进一步强化这种记忆重构。儿子去世当天的降雨,使雨与死亡记忆形成固定联系。每当下雨,阿和眼前的公园便被过去的雨路、认尸现场和葬礼景象所覆盖,身体仍处于当下,意识却重新回到过去。由此,第一空间中的自然环境被第二空间重新赋义,客观的雨声、景色不再只是外部事实,而成为携带创伤记忆的符号。第二空间的作用因此体现为:社会规范首先提供评价现实的框架,创伤记忆又在这一框架内部重新组织个人感知,使边缘者既承受“正常人生”的价值压力,又难以从过去的失落经验中脱

离。既有的社会规范要求人向前看、走向未来,而阿和却“总是背对未来倒着走,只注视着过去而活”(p. 22),又说“时间没有过去,时间没有结束”(p. 104),他无法融入线性前进的社会时间,只能退守到记忆构筑的精神空间里消耗生命。由此,外部规范的压力与内在创伤记忆相互作用,使第二空间成为社会价值观念的投射场,同时也成为个体不断重新解释现实的精神空间,两者由此形成相互强化的循环,使边缘者长期处于社会规范与创伤记忆共同作用的精神空间之中。

4. 无家可归者的共同体: 生存实践与空间意义的重构

第一空间的物质排斥与第二空间的精神压迫,共同构成边缘群体的双重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边缘者只是被动承受压迫的客体。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强调,被支配的边缘位置恰恰孕育着抵抗可能性,被排除者可以通过日常实践,在秩序缝隙中建构出兼具抵抗性、超越性与开放性的第三空间,以此对抗主流秩序压迫,重建生命意义与尊严,作品中无家可归者之间形成的非正式自治共同体正是这种可能性的具象化。基于这一特点,以下将从三个性质说明《JR 上野站公园口》中无家可归者的自治共同体这一第三空间的具体体现,考察无家可归者如何在抵抗压力的同时,重建具有抵抗性、超越性与开放性的共同体生存空间。

首先,第三空间的抵抗性体现为对既有空间秩序的日常重建。面对定期清理与持续监视,流浪者并没有彻底放弃生存空间,而是在长期博弈中形成了自发的生存策略。聚居区内部存在默认的地盘划分与邻里默契,同区域的流浪者之间形成了无需言说的互助联结:“不只是聊天、喝酒的邻居往来,还会留意有没有人病倒、有没有外来者接近、小屋的状况如何”(p. 149)。这种完全依靠默契运行、无任何制度强制的互助秩序,是对行政管控的软性应对:管理方试图以号码牌将流浪者拆解为孤立的可统计个体,无家可归者却以自发联结将被分散的个体重新凝聚为互相支撑的群体。面对强制清理,这种应对的日常性更为凸显:有人花五百日元进入影院,借商业空间的闲置时段熬过寒夜,“在暖气充足的影院柔软座椅上,一直睡到末场电影结束的清晨五点”(p. 149);有人将贵重物品存入车站储物柜,搭乘山手线环线彻夜绕行。他们以最低限度的消费为掩护,将商业座椅、环线车厢这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空间,临时转化为躲避风雨的栖身之所。斯科特指出,处于依附地位的群体通常采取偷懒、装糊涂、暗中破坏等日常形式而非正面冲突来维护自身利益,对抗剥削与压迫;这些“弱者的武器”不追求直接改变统治结构,却能在长期博弈中维持群体的基本生存与尊严。以此衡量,影院与环线车厢的临时挪用、地盘默契与邻里照看,均属于典型的日常性生存调适,其意义在于保住生存底线,而非在正面意义上推翻既有秩序。从第三空间的视角来看,这些并不以公开对抗为目的的日常策略,恰恰说明抵抗并不必然发生在制度性冲突层面,而可以嵌入对空间资源的重新使用之中,这些日常性的行为实践构成了第三空间抵抗性的具体表现。

其次,第三空间的超越性体现为对主流价值尺度的重建。在主流社会评价体系中,无家可归者是人生失败者,是没有价值的多余之人;但在流浪者共同体内部,这套评判标准不再具有唯一的支配地位,生存本身重新获得最朴素的价值,生命尊严不再完全依附于社会身份与物质财富。没有人追问对方流落街头的原因,没有人用收入、地位、家庭状况衡量他人价值。有人每日捡拾空瓶换取生活费,有人坐在檐下晒太阳消磨时光,不同生活方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都被视作个体自主选择的生存状态。那个坐在会馆檐下、膝头卧着白猫、给麻雀投喂面包边的老人,在路人眼中是邋遢可怜的流浪者,但在自己的小空间里,他是照料弱小生命的主人,完全掌控着自己的生活节奏。知识人出身的小茂即便流落公园,依然可以凭借学识为同伴讲述上野公园的历史掌故,在精神世界里保有丰盈与体面。索亚提出,第三空间能够拆解既定的社会等级与价值秩序,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评判逻辑。共同体这一第三空间的意义正在于此:它跳出了成功和失败、正常和异常的二元评判框架,使生存本身重新成为价值判断的

标准,重建了以生存本身为基础的尊严。这种对既有价值体系的悄然消解,是比物理层面的应对更为深层的精神重构。

最后,第三空间的开放性体现为对共同体边界的重建。现代社会的职场、社区、家庭等各类空间,都设置了严格的准入门槛,以身份、财产、血缘等标准筛选合格成员,将不符合规范者不断向外排斥。而这个流浪者自治共同体没有严格的准入门槛,不需要身份证明、经济能力、血缘地缘关系,个体只需遵守基本的共处默契,便有可能在其中获得暂时的容身之所。教师出身的小茂、东北务工的阿和、白发老妇、壮年日工……这些原本属于不同社会阶层、有着截然不同人生轨迹的人,在主流社会中或许永远不会产生交集,却在公园角落成为邻居。不仅如此,这份包容甚至跨越了物种边界:野猫、鸽子这些同样在城市缝隙中求生的小动物,也成了共同体的共享成员。小茂会给母猫做绝育手术,特殊清扫时也不忘带上猫;檐下的老人会省下面包边喂麻雀。在主流社会不断设置边界、筛选合格成员的对照下,这个边缘第三空间反而呈现出索亚所言的“阿莱夫”式包容¹,它接纳所有被中心秩序忽略的生命,突破了通常以身份、财产和物种为基础的边界,为不同形态的脆弱生命提供了暂时的容身空间。这个共同体,不仅重建了“人”的关系网络,也在更大意义上重建了对脆弱生命的空间包容。

然而,这个共同体并非没有裂隙的乌托邦,在其温情与互助的表象之下,也交织着由于资源极度匮乏、精神创伤内化而产生的内部冷漠与隐性排斥。其一,地盘意识同时制造了互助与排斥的双重效应。同一区域内的流浪者会擦亮眼睛观察小屋,看是不是有人病倒、有没有其他地方的入侵者靠近。入侵者一词本身便标明了共同体边界的排他性。此外资源竞争进一步激化内部张力:捡来的杂志可以拿到旧书店卖钱,还听说“有流浪者因为彼此争抢杂志而被踢落轨道,遭电车轧死”(p.82)。他们一旦短暂地拥有某种资源,便随时面临被剥夺的危险,并始终受到不安的纠缠。

其二,共同体内部存在着无声的社交排斥与防御性疏离。阿和在进入上野公园流浪后,虽然身处流浪者的物理集群之中,但在多数时间里,他与其他流浪者之间保持着一种客气却极为疏离的距离。流浪者们极少主动打听彼此的过去,这固然是对隐私的尊重,但本质上也是一种由于自身精神荷载过重、无力承担他人痛苦的防御性冷漠。

由此,共同体既非全然对抗性的领地,也非理想化的乌托邦:它是在规训与缝隙之间生成的、不稳定的团结。唯其如此,被排除者的主体性才不是浪漫化的英雄叙事,而是带着内部张力、在有限可能中持续进行的生存实践——这正是第三空间命题的辩证内涵。

5. 三重空间的交错

前文分别从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与第三空间三个维度考察了《JR 上野站公园口》中的空间书写,但这种区分应当被理解为分析上的层次划分,而非三个彼此独立、依次出现的空间实体,若将其重新放回具体场景,可以发现三者是共时存在、相互渗透、彼此制约的动态辩证结构。

以作品中的“帐篷-清扫-转移”这一具体场景为例,蓝帐篷首先构成无家可归者赖以生存的第一空间,是其身体停留、物品存放和日常生活展开的物质场所。然而,帐篷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对象。管理部门通过编号、清扫以及“草坪养护中”等标识对帐篷进行分类和重新命名,将其表征为不符合公共空间规范的存在,这意味着第一空间从一开始就已经与第二空间中的社会表象和价值判断交织在一起。与此同时,无家可归者面对清扫所采取的转移、重新搭建和寻找新的落脚点等行为,又使原本被管理和规定的空间重新进入生活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同一顶帐篷同时具有物质居所、被规训的空间表象以及主体实践对象三重属性,三个空间维度并不是依次发生,而是在同一空间事件中共同运作。

¹索亚在《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中用博尔赫斯的《阿莱夫》隐喻第三空间是一切都包含在其中的空间,阿莱夫是一个直径仅约一英寸的球体,整个空间宇宙的总和都在其中。

又如作品结尾阿和从站台坠落时出现的精神图景,也呈现了三重空间的交错。他在生命最后一刻看到“今年刚插完秧的田野……我是在火车上吗?……哦,原来是常磐线……正从原之町开往鹿岛站……那是新田川”(p. 162),现实中的站台与记忆中的故乡在意识中重叠。此时,第一空间中的车站并没有消失,而是与第二空间中的故乡记忆共同构成新的空间感知;与此同时,主体通过记忆重新赋予现实空间以意义,使原本单纯的坠落场景呈现出回归故乡的意味。这个场景表明,三重空间并非可以彼此分割的三个层次,而是在主体经验中同时发生作用:物质空间提供现实条件,空间表象赋予现实以意义,而主体实践和感知又不断重新组织二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从《JR 上野站公园口》的整体空间书写来看,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与第三空间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先后次序。空间排斥可能同时产生新的空间表象,空间表象又会影响主体对现实的感知,而主体的生活实践则可能进一步改变既有空间的使用方式与意义。三者由此形成一个相互渗透,彼此作用的辩证结构。

6. 结语

综上,本文从索亚第三空间理论出发,重新考察《JR 上野站公园口》的空间书写。作品中的三重空间是同时存在并持续相互作用的,第一空间中,上野公园的规则、清扫和编号管理,以及小屋的物理脆弱性和监视机制,共同划定了边缘者的生存边界;第二空间中,职业、家庭等社会规范进入个体认知,并与创伤记忆相互作用,使外部秩序转化为持续的精神压力;第三空间则通过流浪者共同体的日常实践,对既有秩序展开抵抗、价值重估与开放性重组,并最终指向生存空间和生命尊严的重建,三者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渗透、辩证统一的,无家可归者的生存困境因此不能仅仅被理解为“被排除”的结果,其空间实践也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排除之后的反抗”;二者实际上同时存在于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中。正是在这种排斥与重构、规训与反抗、中心与边缘持续交错的关系中,作品所呈现的第三空间才具有真正的辩证意义。

柳美里通过三重空间的交错书写,没有把无家可归者塑造成单纯的被同情对象,也没有将其生活实践简单英雄化。作品提示我们重新思考“空间权利”: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涉及谁能够进入,也涉及谁能够停留以及谁有权赋予空间新的意义。因此,《JR 上野站公园口》的意义不只在于呈现某一群体的困境,也在于提示城市正义需要关注那些无法通过稳定住宅、职业和家庭关系获得空间保障的人。由此,本文从三重空间入手,由生存实践到空间重构的分析历程也可为考察其他都市文学中的居住不稳定、公共空间使用与社会排除提供一种分析路径。

参考文献

- [1] 厚生労働省. ホームレスの実態に関する全国調査報告書[EB/OL]. <https://www.mhlw.go.jp/houdou/2003/03/h0326-5.html>, 2003-03-26.
- [2] 厚生労働省. ホームレスの実態に関する全国調査(概数調査)結果について[EB/OL]. https://www.mhlw.go.jp/stf/newpage_72779.html, 2026-04-27.
- [3] 丹羽 理. 都市の周縁に生きる[C]//日本文化人類学会研究大会発表要旨集, 2022 卷, 日本文化人類学会第 56 回研究大会. 東京: 日本文化人類学会, 2022: A06.
- [4] 山崎正純. 天皇・ホームレス・浄土真宗柳美里『JR 上野駅公園口』試論[J]. 昭和文学研究, 2019(78): 83-97.
- [5] 孫軍悦. 「あんたには在る. おれたちには無い」: 柳美里『JR 上野駅公園口』における<ホーム[J]. 立命館国際研究, 2024, 37(2): 17-34.
- [6] 朴银姬. 论《东京上野公园站》中的空间叙事与记忆重构[J]. 当代外国文学, 2022, 43(3): 77-83.
- [7] 宋婷. 爱德华·苏贾的空间理论视域下《长歌》中七月的自我身份建构研究[J]. 认知诗学, 2024(1): 223-237.

-
- [8] Soja, E.W. (1996)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Blackwell Publishers.
 - [9] 米歇尔·福柯, 著.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10] 柳美里. JR 上野駅公園口[M]. 東京: 河出書房新社, 2017.
 - [11] 米歇尔·福柯. 权力的眼睛[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